

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刍议

陈 代 光

河南地理研究所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

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刍议

陈代光

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，历久不衰；地方志数量之多，种类之齐全，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。这些方志，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“资治·存史”的积极作用，积累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。今天，这些地方志仍然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，进行四化建设的宝贵财富。

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，对地方志的修纂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胡乔木同志早就提出，要用新的观点，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编修地方志。因此，今天编修新的《河南地理志》不能率循旧章，拘泥于旧方志的体例、方法和内容；要脱出旧方志的窠臼，创造出新的布局；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，采用新的材料和现代科学技术，编修出新的《河南地理志》。

为了更好地贯彻编修新志的原则，使新修的《河南地理志》具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，兹就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的有关问题，提出个人粗浅的看法，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。

一、关于《河南地理志》的内容问题

新编的《河南省通志》规模宏大、卷帙浩繁。除地理志外，还

有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人口、民族等专志。这就要求我们在编修志书时正确地处理各专志间的关系，使各个专志在内容上有明确的分工，切忌重复芜杂。

《河南地理志》是《河南省通志》中重要的一志，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？如何正确处理地理志与其他专志的关系？这些问题应该加以讨论研究。

如上述，地方志是记述一地区（行政区或地理单元）的自然、历史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一种体例，地理志则是记述某地区各种地理现象的基本特征，地域差异及其演变规律的、综合性很强的专志。

旧的地方志中，大都有山川、政区沿革等地理方面的内容。但内容极端贫乏，而且罗列的仅仅是一些孤立的地理现象，没有阐明这些地理现象之间的弁证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。这样的内容，当然不成其为地理志，也不可能适应今天四化建设的需要。

编纂新的《河南地理志》，必须交破传统方志的窠臼，按照现代地理学的科学体系，举凡地貌、水文、气候、土壤、动植物、工业、农业、交通运输、城镇、人口、民族等等有关河南省自然地理、经济地理方面的内容，均应一一各载，并分析、论证这些地理现象的特征，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弁证关系，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发展演变的原因、过程及规律。这样的地理志才有参考价值、对今天的社会主

义建设才有所教益。

《河南地理志》的内容既有自然地理，也有经济地理，那么，它与其他专志在内容上可能有重出的现象，这就须要正确地处理地理志与其他专志的关系。

有这样一种见解：《河南省通志》中之地理志，只需记述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，经济地理方面的内容可以舍掉。理由很简单：经济地理的内容与工业、农业等专志的内容是重复的。这些同志认为，这是处理地理志与其他专志关系的最佳办法。

对上述见解，我们不敢苟同。我们认为，这样的见解是片面的，不正确的，其根源在于对地理学科学性质缺乏理解。按照这种主张编纂地理志，势必割裂了现代地理学的科学体系，使许多重大的经济地理现象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和阐释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。恰好这样的缺陷是传统地方志中所长期存在，并有待今后加以解决的。

众所周知，现代地理学有其独立的、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，它是研究各种地理现象空间分布规律的科学。按其科学性质及研究对象的差异，又可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部门。前者是研究地理环境的形成、发展和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；后者是研究社会生产分布规律，即研究既成的生产分布状况，分析形成这种分布状况诸条件的科学，侧重于研究国民经济总投资的地区分布，各个生产部门、生产环节及要素在空间组合的状况，各个经

济区、经济中心之分工及其发展比例关系的安排等问题。根据地理学上述之性质及研究对象，在地理志中无论是自然地理之论述，也无论是经济地理之内容，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。

至于《河南省通志》中的各种专志（如工业、农业等专志），侧重于记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、经验教训；记述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的新成果；论述某一工作，某一社会现象发生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；不涉及，或很少涉及这些事物发展变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。例如农业志，其内容大体包括土壤、种子、植保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等等。记述时偏重于这些要素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、经验教训，所采取的农业技术措施等。不谈，或很少谈及这些现象地区分布的特征，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。而这些正是经济地理中农业地理记述和论证的内容。所以，只从所使用的资料及涉及的内容看，好像农业志与经济地理大致不差。但经济地理侧重于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；而农业、工业等专志则偏重于发展过程规律，即时间过程的探讨，两者所站的角度不同，分析、论述问题的侧重点不同，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也是不同的。因此，以为经济地理的内容与农业、工业、交通运输等专志重复的观点是片面的、不正确的；以为可以用农业、工业等专志代替经济地理的分析记述更是错误的。我们深信，经济地理与各专志之间，只要分工明确，各有侧重，详略得当，就能互

相补充，相得益彰。

二、关于《详今略古，古为今用》问题

编写地方志，要坚持“详今略古，古为今用”的原则。根据这一原则，要求编纂地方志，应立足于近代，着眼于今天；过去的內容要略，今天的要详；记述过去的事物是为了今天的四化建设服务。编纂《河南省地理志》也要坚持这一原则。

“详今略古，古为今用”是统一的整体，但关键是后者。离开了“古为今用”，略古也无益于今，反之，为了今天四化建设的需要，详古也是有教益的。由此，引伸出两个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：一是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的时间上限问题；二是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的目的问题。

在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，邵文杰同志指出：“（地方志）上限起于远古，下限止于一九五八年，可不可以？……我们要不要追溯远古？追溯到什么时候？这是应该研究的问题”。

从目前情况看，各地编写地方志的上限，一般断在鸦片战争。《河南省通志》也大体如此。《河南地理志》编修的时间上限是不是也断在鸦片战争？

所谓“略古”，应从两方面理解：一是时间，二是内容。就时间而言，上限不要断得过远；就内容而论，“古”的东西要简略。一般地说，地方志的编纂必须这样做，重点是努力“收集我们这个

代前进步伐的真实纪录，努力反映这个伟大时代，讴歌这个伟大时代。具体地说，要特别注意收集和反映本地区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英雄业绩，以及我党领导各族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，把新方志创修成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点和地方特色的新型志书”。(1)但是，我们还应该考虑到，地方志各个专志的性质及任务互有差异，有记述自然环境的专志，也有述社会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的专志；加上各地具体情况各不相同。此，在贯彻上述原则，规定时间上限时不能一刀切，应因事因志制宜，灵活掌握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们以为《河南地理志》编纂的时间上限不应在鸦片战争，应当适当向上延伸，有些问题甚至要追溯到远古时代。理由是：

首先，地理志的内容与他志不同，既有政区沿革、典章制度，有各种自然地理现象。政区沿革、典章制度等都有其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。探索、研究其渊源及发展演变的规律，不应当受时间的限制，应当追溯到某一地区这种制度开始形成和始建的时间。至于研究、揭示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发展演变的规律，如干旱规律、土壤形成、演变及分布的规律等，更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。如果不穷源究底，许多重大的、规律性的问题就无从了解。梁寒冰同

(1)《河南方志通讯》 1982、1 7页

志说得好：“举凡历史沿革、行政区划、自然地理、自然资源、自然灾害等，都可以向上延伸至该地区建置开始的时候”。又说：“按立足现代，侧重近代，因事而异地上溯古代的原则，并根据各省实际，确定省志的断限，如建置沿革、行政区划，……可上溯到该省建置之始；自然地理，……民族、宗教等，可上溯至事物之发端”。

(1)这里，梁寒冰同志所说的，正是地理志应当记述的内容。

其次，河南省具体情况与他省不同，河南地处中原，历史悠久，长期是我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；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变，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是他省所不同的。在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时，必须注意到河南省光辉灿烂的历史，并如实地加以反映。如果将上限断在近代，人为地割去河南省光辉而又独具特色的古代，其结果必然是与他省地理志同出一轨，“千篇一律，读者索然”，不成其为《河南地理志》。由此观之，时间上限是否确当，直接关系到《河南地理志》质量的高低问题不应等闲视之。

至于“古为今用”，就是说编纂志书要有明确的目的，要对今天有所教益，要为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也不例外。

我国地方志数千年来之所以历久不衰，绝非偶然。究其原因，历代编修志书者，不管是官修的还是私人编纂的，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，可以说都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上、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需

要应运而生的，它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厚的土壤，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如明末清初的顾祖禹，用了十多年的时间，编修了一部长达一百三十卷，二百多万字的全国性地理志书—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全书自始至终，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。“其普述本意，盖将以民族光复之用”。⁽¹⁾其政治目的何等鲜明。因而成为历代“资治”之必备之书。

古人著述，目的尚且如此明确。今天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编纂新的《河南地理志》，更应该紧密地结合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在编修过程中，应当坚持“古为今用”的原则；详古也罢，略古也罢，都应当是为了今用。离开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，详古固然不对，略古也未必可取。

（三）关于突出地方特点问题

地方志为一方之志书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。所谓地方特点，即区域特征。

《河南省通志》中之地理志，其任务就是努力反应河南省自然和社会经济地理的真实面貌，突出河南省的特点，发挥河南的地区优势，为河南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征信的科学依据。这样的地理志，才能够得上是新型的、上乘的《河南地理志》。

(1)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

1943年 中华书局版

地理志既然要准确地反映河南省的特点，这就要求在编志过程中，对河南省地理环境、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、深入的分析研究，考其隐微，探其源委，努力捉住河南省的地理特征，在此基础上，显微阐幽，“因地制宜”地，实事求是地反映河南省真实的地理面貌。

河南省无论是历史发展过程，还是地理环境或社会经济条件等，与其他省区相比较都有明显的差异。主要表面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从历史上看，河南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，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，长期是我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；由于位置居中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是我国古代水陆交通枢纽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

从地理环境看，河南省跨越北亚热带与暖温带两个气候带；地貌类型复杂多样；江、淮、河、海四大水系统经本省；历史时期，这些河流（尤其是黄河）的变迁对本省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为深远。

从当前看，河南省人口众多（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）。位置居中，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之一，战略地位重要。但河南省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落后的省区之一。但在解放后，河南人民在改造自然、改变落后面貌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上述基本特征，是编纂《河南地理志》时必须掌握并努力加以反映的。一个方志学家，如同一个文艺家。文艺家的任务是深入生

活，认识生活，在概括提高的基础上，塑造一个又一个具有鲜明个性，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正确、生动地反映生活的真实，培养、教育人民群众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，激发和鼓舞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。一个方志学家，同样是要深入实际，进行调查研究，认识 and 了解一地（行政区或地理单元）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的规律，在此基础上编纂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香的地方志书。在我国历史上，一些有见识的方志学家就是这样做的。如宋代范成大编纂之《吴郡志》，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范例。他捉住了吴郡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的两个特征：园林之胜及虎邱古绩，单列专卷，着力加以记述，好像一个画家捉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两只眼睛而浓墨描绘一样，收到了突出地方特点的良好效果。梁寒冰同志说：“我国幅员广大，人口众多，又是多民族国家，地区间的差异性很大，必须注意地方的特点”。
(1)这种真知卓识，值得我们重视。

（四）关于编写方法问题

采取什么方法撰修地方志，关系到志书质量的高低。因此，应当重视撰修地方志的方法问题。

旧的，由秀才做文章的修志方法业已过时。其所以过时，是因为：仅由少数人脱离实际，闭门造车。采取这样方法撰修的地方志，

(1)《中国地方史志通讯》 1981年5·6期 41页

缺少科学性，不足征信，自然不能满足今天四化建设的需要。

撰修新的《河南地理志》，记述的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地理现象，故在方法上更不能囿于传统的程式。应该积极采取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撰修，使新的《河南地理志》体例更科学、内容更翔实，记述更准确，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。

采取什么方法撰修《河南地理志》？

首先，要充分认识到《河南地理志》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专志。内容丰富，头绪万千，纵横交错，互相制约；既有自然地理方面的，也有经济地理方面的；既包括现代地理，也包括历史地理。因此，撰修的任务不是个别学科所能承担的，更不是仅靠少数人完成的。必须多学科共同攻关，各方面的人员协同作战。建立专门编纂机构，组织专业人员固然重要。但还应该“广罗人材”，“不拘官吏生儒，草泽布衣”，社会上凡热心于地理志工作，且有一技之长者，就应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将其工作纳入修志的轨道上来，组成一支浩大的修志队伍，才能完成撰修《河南地理志》的任务。

其次，资料要齐全、可靠。举凡反映河南省自然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历史与现状等方面的材料，均应广征博取，详细占有；准确核实，去粗存精；高度浓缩，陶铸珍品。

我国地方志资料非常丰富，单地方志一项，保存至今的数达八千多种，其中河南省有五百五十多种。此外还有诸如正史、裨史，

笔记、档案、族谱、家谱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，以及各种图、表、报告等，都为撰修《河南地理志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对这些资料，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以利用。

但是，我们应该认识到，这些文献资料及地方志，大都出自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之手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，这些资料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各种问题。因此，对这些资料不能轻信轻否，应该加以核实、鉴定，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。在资料不齐全，或没经过鉴定之前，不要仓卒编修，以免后患。

生长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酈道元，在注释《水经》时，参阅了430多种文献资料。他对前人的成果及文献资料，总是加以认真的分析、鉴别、筛选，力求“情观约取”。所以他不但对《水经》作了精详的注释，还纠正了《水经》中的许多错误。如文献记载，战国时燕太子丹遣义士 轲刺秦王时，相别于易水之滨（今河北省易县南）。酈道元在翻检了大量文献，经过分析研究之后，弃了这种传统的观点，正确地指出：“余按遗传旧述，多在武阳（今河南省原阳县），似不践此（易县）也”。（1）明末清初的顾祖禹，治学严谨，考证精辟，在其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一书中，纠正了前人一些重大的错误。例如汉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市）西南的昆明池，原是模拟古昆明国的洱海（今云南省大理）的形状开凿的。但晋代的

（1）《水经·易水注》

臣瓚误将今昆明市的滇池当作洱海，此后迷惑了学者一千三百年之久。直到顾祖禹撰修《读史方輿纪要》时，才加以纠正。可知，资料的齐全、可靠，是撰修《河南地理志》的基础。

第三，进行野外调查考察。各种地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实体，即使是历史地理现象，由于时间的久远，虽然发生了变化，甚至已经泯灭，但总会遗留下一些残迹。因此，要认识、了解各种地理现象，固然要依靠文献资料。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及其他原因，文献记载总是有其局限性的，不是记录有缺略，就是记载有谬误，必须借助于野外调查考察，加以补充和修正。我国古代一些著名的科学家，就是通过野外调查考察，获得了对事物的卓识灼见，从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的。例如北魏时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，为了注释《水经》，不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、图表等，而且进行了长时期的、艰苦深入的野外调查访问工作。他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。为了弄清滹水（今滦河）的流经，他“询之故老，访之史籍”，发现了《水经》中的记录“并无文证”，纠正了《水经》的错误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在《水经注》中发前人之未发，使《水经注》这部著作成为一代巨著。又如《徐霞客游记》这部名闻中外的地理著工，是明代万历年间徐霞客（徐宏祖）沐雨栉风，不畏辛劳，长途跋涉，足迹遍及今十六个省区，观山察水，悉心研讨的结晶。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也十分注重野外实地调查。他在《周^々谷列传》中自述

修《永清县志》时说：“余修《永清县志》，……余周历县境任游，以尽委备”。他撰修方志，很注在实地采访，走出故纸堆，在实地中搜集活的资料，充实方志的内容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没有艰苦深入的野外调查研究，很难想像酈道元、徐霞客、章学诚等人在科学研究上能攀登这样的高峰。这样的优良传统，今天值得我们继承，并加以发扬光大。

第四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撰修《河南地理志》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及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，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。当前，已经为地理学广泛应用的、新的科学技术有现代计算技术、孢粉分析、碳¹⁴等。这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，大大地改变了地理学研究的状况，使地理学的研究从宏观的、定性的分析研究逐步过渡到定量分析研究的新阶段。对各种地理现象的分析，不但有质的概念，也有量的判定。大大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，使地理学建立在更科学、更可靠的基础上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。这也是今天撰修高质量的《河南地理志》的可靠保证。